

# 日本佛教史纲

〔日本〕村上专精著



# 日本佛教史纲

〔日本〕村上专精 著

杨曾文 译 汪向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日本文化名著選)  
〔日本〕村上專精著  
**日本佛教史綱(上、下卷)**  
東京創元社 1939 年版  
据日本东京创元社 1939 年版译出

### 日本佛教史綱

〔日本〕村上專精 著  
杨曾文 译 汪向荣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 · 247

---

1981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7千字  
印数 1—4,800 册      印张 10<sup>7</sup>/8 插页 5  
定价：1.50 元



作者村上专精博士

## 中译本序

佛教传自天竺，它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日本都曾受过佛教的影响，今天它还在起着有形无形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传到日本后，也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为了全面地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历史，应当了解佛教。

日本研究佛教的学者，人数众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他们研究的方法，研究成果很值得借鉴。随着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双方学术交流也将日益频繁。通过双方学术交流，求同存异，切磋琢磨，学习对方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缺点，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对促进世界文化发展都有利。

日本学者村上专精著作甚富，是日本研究佛教史的著名学者，所著《日本佛教史纲》出版已八十年，它开一代风气，在日本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今天佛教研究比八十年前有了新的进展，此书仍有参考价值。

杨曾文同志将这部书译出，对增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乘此书付印的机会，简单地说几句话，借以表达我的欣慰的心情。

任继愈

1979年7月于北京

---

## 译者前言

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历史。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传入日本，逐渐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隋唐时期及其以后，在中日两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曾向中国派出大量留学僧，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僧侣到了日本。随着中日之间佛教的交流，中国佛教的各个主要宗派（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相继传入日本，而在十三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民间信仰、习俗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宗派，如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中，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直到今天，佛教在日本社会上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研究日本佛教史对于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的历史文化都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对日本佛教史尚未开展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译者翻译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就是为广大读者了解日本佛教史提供一个方便，为今后的专门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

村上专精（1851—1929）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佛教学者。他八岁出家为僧，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学习，对印度、中国、日本的佛教教义、历史以及佛教因明学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他努力学习西方文化，并且运用西方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佛教，对日本佛学界发生重大影响。从1887年开始，他先后担任曹洞宗大学讲师、东京大学讲师、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科教授，创办过佛教讲话所、《佛教史林》杂

志、东洋高等女子学校等，著有《佛教统一论》、《日汉佛教年契》、《因明学全书》、《佛教论理学》、《真宗全史》以及《日本佛教史纲》等。村上在日本学术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佛教启蒙家”、“佛教史研究的先驱者”<sup>①</sup>。

《日本佛教史纲》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 1898 年，下卷出版于 1899 年。此后，此书曾几经再版。现在翻译所用的是 1939 年日本创元社列为“日本文化名著选”的再版本。这个版本曾由著名佛教学者宇井伯寿（1882—1953）作了校订。当时称村上专精是“佛教史学的泰斗”，书后所附宇井伯寿写的“解题”对此书评价说：“先生的著作……对史实、时代、教理、制度、变迁等都作了精巧的安排，提示了日本佛教史的大纲，读起来极易通晓一切方面”；在佛教史学界“本书据有指导地位”，“长期以来还没出现可与此书媲美的著作”。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日本有日本佛教通史著作四十余种，其中战后新著十多种，但学术界对于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仍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提示了日本佛教史的基本轮廓”，“抓住了纲要”<sup>②</sup>。

统观全书，本书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在关于佛教教义的介绍方面，比较注意考查各个佛教宗派产生和发展的源流，并对该宗派所依据的佛教理论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区别进行对比说明，使人对于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的演变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例如作者在论述天台宗、真言宗时，不仅介绍了这两宗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和教义，而且还对比这两宗在中日两国的区别。作者对日本一些独创的宗派，如净土真

① 参看 1969 年版日本《佛教大年鉴》。

② 参看日本《中外日报》1974 年 12 月 17 日载日本“东方学会”的报道《关于学问的回忆》及千叶隆乘等人著《佛教史概说（日本篇）》序（日本平乐寺书店 1973 年版）。

宗、日莲宗等的教义，则更着重介绍其特点。

(二) 讲述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时，不仅列举史实介绍了以天皇为首的历代统治阶级崇信和扶植佛教的情况，也介绍了某些佛教僧侣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揭露了佛教界腐化堕落以及盘剥人民的一些情况。作者对日本佛教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僧兵”的起源和在社会上的活动情况，也有简单明了的介绍。这些对于我们加深对日本历史的了解也有参考价值。

(三) 本书对历代佛教制度，如僧官、僧律、度牒等也作了简括集中的介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僧侣上层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以及佛教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

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作者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佛教学者，他没有深入分析佛教与不同时期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也没有从本质上揭示佛教的社会作用，而对佛教和高僧宗祖多有溢美之辞。作者对历史上一些崇敬佛教的天皇、将军等统治者往往过于推崇颂扬，对佛教宗派的传承关系也过分渲染，因而有些章节使人读来索然乏味。自然，由于作者所处社会和地位的局限，我们对此不应苛求。

总的说来，本书对于研究日本佛教、思想、文化、历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仍不失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它所提供的某些线索和资料对我们还是十分有用的。

原书下限到“明治维新”。为便于读者了解日本佛教史全貌，译者在书后附有写到战后的日本佛教史年表。书中提到很多古代国(地)名，译者虽已标出相当于现在的县名，但并没有一一作注；为方便读者，在书后特附有日本古代国名与现在县名的对照表。

本书译完后，曾自行校核，最后又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汪向荣同

志仔细地校订过。然而限于译者的水平，书中可能仍有不少疏漏不足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蒙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先生写序，在译书过程中，也得到中国佛教协会已故高观如先生、世界宗教研究所郭朋、黄心川和牟钟鉴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杨曾文

1979年8月1日于北京



圣德太子像(仁和寺藏)



法隆寺西院伽藍全景



鉴真和尚像(唐招提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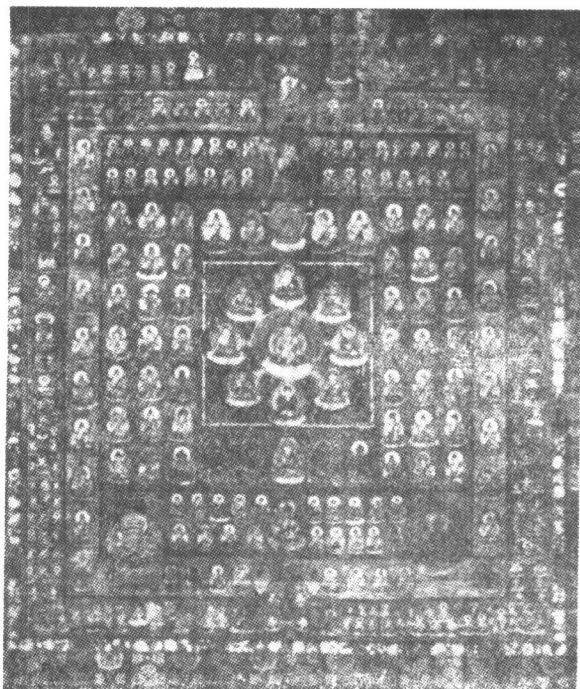
传教大师像(圆城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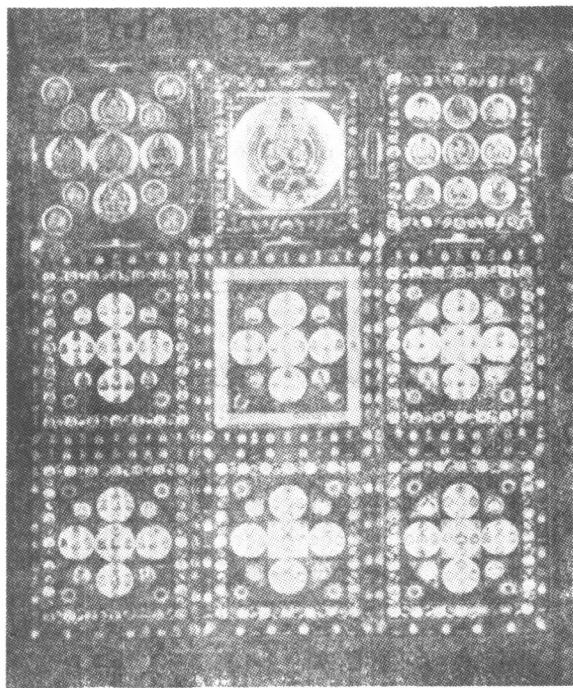
弘法大师像(教王护国寺藏)



智证大师像(圆城寺藏)



胎藏界曼茶罗图(教王护国寺藏)



金刚界曼茶罗图(教王护国寺藏)